

## 论少数民族区域教育的危机

——内蒙古四县(旗)教育调查报告分析\*

钱民辉

根据“中国区域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的需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1994年9—10月对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兴和县、商都县、镶黄旗四个地区的教育做了实地调查,从历史、现状、问题及趋势入手,分别考察了这四个县(旗)的基础教育、民族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从调查的结果显示,这四个县(旗)都属于内蒙古的贫困地区,解放前并无完整的教育体系,解放后由于国家与当地政府的重视,逐渐地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在地区尚未脱贫的情况下,实现了教育超前发展的策略。而在教育超前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少数民族区域具有代表性,如果不对这些问题的构成和趋势做出分析和解决,将会造成我国少数民族区域教育发展的危机。本文仅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分析这些问题的构成及趋势。

---

\* 本文引用的调查材料来源于李建东《商都县教育调查报告》、《兴和县教育调查报告》;包智明《镶黄旗教育调查报告》;苏日娜《苏尼特右旗教育调查报告》,均未刊。

## 一、“投入”与“回报”的问题

建国初期,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极其落后。内蒙古全区没有一所高等院校,仅有3所中等专业学校,4所中等师范学校,31所中学。各类学校在校生总数仅占人口总数的5.69%。而为数不多的学校,又集中在城镇。各族人口的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

建国后,自治区教育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无论是学校数,还是在校生数,都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建国40年来内蒙古四县(旗)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当地继续贫困化并存,教育不但没有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负担。在这些贫困的地区中,人们把脱贫的希望寄托于教育,有的县将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拨给了教育系统,作为内蒙古的贫困县之一,兴和县1991年财政收入1000.9万元,教育经费为410万元,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的41.0%;1992年财政收入为780万元,教育经费为487万元,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的62.4%;1993年兴和县财政收入为980万元,教育经费已达652万元,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的66.5%。从商都县来看,县乡、农民是教育投资的主体,1992年,商都县财政收入948万元,教育经费625.3万元,占县财政收入的68.8%;1993年,全县财政收入1336万元,教育经费922万元,占县财政收入的70%。而镶黄旗的教育经费却占到了旗财政收入的76%。随着教育的不断增长,教育经费的需求仍在逐年提高。

1993年,商都县乡村中学由三年制改为四年制,需要增加教育经费200多万元,增加教师100多名及相应的校舍、设备。学制改革要求商都县所属的21个乡镇3年内完成,各乡平均每

年增加1万元的经费支出。1993年商都县为实现“普及实验教育县”，全县总投入130万元，其中各乡镇投入76万元。分级办学实际上是乡级办学，更加重了乡级财政和农民的负担。在这样贫困的县城和乡镇，这么少的财政收入办了这么大的教育，当地政府哪有能力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哪有能力再对教育增大投入。而教育的回报是什么呢？商都县普通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每年有200多名毕业生考入全国各大专院校学习，政府期望他们毕业回县工作，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这些毕业生的绝大多数特别是本科学历的毕业生几乎没几人回到本县或乡镇工作；再以兴和县一中为例，1982—1993年间，共有719人考入大专及本科院校、355人考入中专学校。但是，考上区外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回兴和工作，回到兴和工作的大多为在集宁读书的中专毕业生、中师毕业生。1993年回来50几人，1994年只回来10人。事实证明，贫困地区办教育却在为发达地区培养人才。但是，在镶黄旗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镶黄旗一直是重视教育的投入，1983年全旗就实现了无文盲旗，15—45岁脱盲率达97%。1984年全旗普及了初等教育，1986年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是全国116个先进县中惟一的一个牧业旗（县）。镶黄旗从1993年开始定编，目前各单位基本上是超编，毕业回来的大中专学生已无单位可接受，到1994年10月仍有17人待分配。这种情况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对投资教育发生了动摇。

根据上述情况，本文分析认为，教育不单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活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在教育上投入资本，可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从而提高生产率，促进当地生产的经济效益。而对个人而言，投资教育（包括学费、生活费及接受教育期间不能工作而失去的工资）使他具有了社会流动的资本，可以脱离

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获得较好的工作和地位。教育对个人的回报是逐级增加的。既然教育上的投资可以带来个人的社会流动与经济效益,而贫困地区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那么,这种投资完全由当地政府或乡镇来负担就是不十分合理的。事实也说明,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在发达地区是一种互为促进的关系,而在贫困地区教育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反而成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负担。而且,当地也出现了“受教育的失业者”,有的旗的待业人员正以 300 人/每年的速度递增,这种状况是当地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也是当地经济贫困与资源限制造成的。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我们还应当从教育与文化等方面反思这种状况。

## 二、“避蒙趋汉”:双语教育的危机

建国初期,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极其落后。1949年,全区只有民族中学 3 所,在校生 785 人,占当时中学在校生总数的 11.2%;民族小学 681 所,在校生 46821 人,占当时小学在校生总数的 13.3%;在 4 所汉语授课的中等师范学校中,有蒙古族学生 148 人,占当时中师在校生总数的 8.8%;在 3 所汉语授课的中等技术学校中,有蒙古族学生 3 人,仅占当时中专在校生总数的 0.5%。

建国以后,党和国家为改变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状况,为尽快消除民族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民族教育。政府对蒙语教育的投入很重视,建立起蒙语和蒙汉语授课的幼教、小学、中学、大专院校的教育体系。但这几年用蒙语授课的民族学校出现了生源短缺问题,而汉语授课的学校出现生源膨胀的趋势。从商都县、西苏旗、

镶黄旗、兴和县来看,牧民已要求其子女学习汉语,使用汉语生活。而且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择校”。如,在镶黄旗新拉格镇设有两个公办幼儿园:民族幼儿园和第二小学幼儿园。民族幼儿园条件较好,但因蒙语授课,却只有100个学生。而条件较差的第二小学幼儿园,学生多达380人。其中,蒙古族为117人。在商都县,散居的蒙古族完全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能够使用蒙语交流的蒙古族只有小庙嘎查的31户居民。在汉语的包围下,蒙语犹如一座孤岛。使用蒙语学习、会话对于散居的蒙古族儿童来说已经生疏了。民族学校只好让散居的蒙古族儿童第一年学习蒙语,这样民族学校的学制由5年改为6年。在学校学习期间,学校规定课堂上、吃饭时必须用蒙语会话,但是学生们在课后、校外仍用汉语交流。蒙语对他们来说却成了“外语”。

1993年,仅商都县的蒙古族学生在汉语初中学习的有124人,在汉语高中学习的有20人。小庙嘎查的牧民也开始要求他们的子女学习汉语,1993年,有8个小庙嘎查的蒙古族学生到十八顷乡的汉语小学。本来人数不多的蒙古族学生,纷纷转入汉语授课学校,民族学校的蒙语授课逐渐被汉语授课取而代之,双语教学实际上成了以汉语为主、兼学蒙语的授课形式。

据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是,(1)受本县(旗)地理、自然资源限制,当地民族经济发展缓慢,民族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2)中高等民族院校蒙语授课专业单一,如畜牧、兽医等专业人才已趋饱和,需要开辟的专业,并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畜产品加工专业、乳制品加工专业等无蒙语授课。(3)蒙语授课的学校生源素质差,如西苏旗蒙中除一小部分为本镇的之外,大部分是从牧区来的,而牧区的学生成绩都偏低,有些学习好一点的是不愿意在这种环境中学习的。(4)蒙语授课学校的师资问题较多。教师合格率仅有60%左右,教师的专业结构老化,政治、体

育、汉语言教师严重不足(或不合格),教师队伍不稳定,流失现象严重。(5)地方党政机关、行政部门、企业公司在招工招聘中,明文要求蒙汉兼通,但在实际录用上,侧重汉语水平。(6)经由汉语授课学校毕业的蒙族学生在升学与择业方面明显地优于蒙语授课学校毕业的学生,其社会化程度也高于后者。

对于上述问题,如果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民族教育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危机,是文化上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碰撞的结果。当然,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能绝对孤立和一成不变的。文化变迁是经常发生的。文化上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或民族与民族之间总要接触、交流,总有发明,总会发现,总要创新。因此,蒙族在与汉族更多更密的接触中,其文化变迁的程度、速度、范围、性质就很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民族教育的发展问题,特别要注重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相融和互补上进行民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从少数民族的区域和文化的文化特点出发,设计民族教育的未来。培养能与人和谐共处、适应社会、具有民族特色、能为本民族和国家做贡献的不同层次人才。

### 三、游牧民子女的失学与辍学问题

由于游牧民家庭生活困难,游牧民子女失学与辍学较多。牧区子女上学费用高于农区,游牧民族子女上学要寄宿学校,在苏木寄宿的学生每月费用不低于40元,在旗里寄宿的学生每月费用不低于100元。有许多游牧民家庭经济困难到交不起学费,有的学校的学生欠学校的伙食费竟达16—17万元之多,父母上学时欠学校的伙食费,20年后,其子女来上学接着欠。经济特困的游牧民子女失去了上学的机会,特别是女童失学较多;由于西苏

旗的经济完全是靠天养畜,教育并没有改变多少这里传统的经济状况,而且十来岁的孩子已能承担起家里的劳动,所以,游牧民子女的辍学问题非常严重。从1976—1993年小学、中学校数递减(1977年小学数达120所、中学数达27所;到1993年小学数达45所、中学数达7所);在校生数也在递减,1976年小学在校生数10336人,中学在校生数4690人,1979年小学在校生数达9850人,中学在校生数达5968人,1993年小学在校生数达6871人,中学在校生数达3469人。1993年西苏旗小学生辍学114人,初中生辍学276人,高中生辍学125人,总计515人。从镶黄旗来看,一中1994年上半年辍学15名学生,其中13名是牧区的学生。

如上事实与数据可以看到,经济贫困是造成少数民族子女失学与辍学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调查中了解到,有很多人认为,少数民族孩子学习差,比不上汉族孩子,所以对孩子的期望值不高,只要能认识几个字就行了。这里我想从理论上找出,为什么少数民族子女学业成就低下,失学辍学多?如果排除经济等外显因素不论的话,应当从隐性因素中去分析这些问题。那么,什么是隐性因素?这种隐性因素表现出来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游牧民族子女的学业失败问题。对于学生学业失败问题的研究,心理学家通常从智商、动机、自我期望等个性特征因素方面寻找答案;教育学家从课堂中的教与学过程进行分析;许多社会学家是从家庭背景、族群特征、学校环境、教师等社会因素做出解释;而根据以提出社会语言学理论假设而闻名的英国社会学者(Basil Bernstein)的研究路线,学业失败可以从社会语言编码(socio-linguistic code)与教育知识编码(educational code)的文化过程中来解释。社会语言编码是指反映在语言中的社会关系,它表明言语者的社会文化特征。一般分为两种编码:精密编码(elabo-

rated code),其特征是普遍性与关联性;局限编码(restricted code),其特征是特殊性和孤立性。<sup>①</sup> 由于学校教育知识的特征是普遍性的,因此学校教育知识编码属于精密编码。根据伯恩斯坦从文化过程角度所做出的分析范式,本文认为,少数民族或游牧民族孩子学业成就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错位。因为以语言为主要交流媒体的现代学校,采用了精密的语言编码,这种文化模式及其反映的社会联系与汉族文化是一致的,但与少数民族则形成了错位关系。由于内蒙古游牧族子女局限编码的族群文化特征,使他们在家庭、族群社会化与现代学校社会化之间有一层断裂层,这就造成了教育起点上的不适应;另外,在学校学习期间,家庭、族群与学校采用的语言编码缺乏一致性,少数民族的孩子要同时用两种编码语言,学会两种思维方式;再说,学校与社会用以衡量、评价学生的知识、能力、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标准也明显不利于他们。<sup>②</sup> 这些因素是少数民族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学校生活,造成学业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失学与辍学的一个非经济性的重要原因。

当然,如上分析仅仅是从语言和文化方面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业失败所引起的失学与辍学的原因进行了解说,这种解说的合理性是不能代替其它解说的合理性,如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而且伯恩斯坦的理论和视野也有局限性,它过于夸大了语言编码对可教育性的影响,即便在英国这类典型国家,把语言编码说成是影响可教育性的惟一的、或主要的因素也是不符合事实

---

① 巴兹尔·伯恩斯坦:《社会阶级、语言与社会化》,转引自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参见唐宗清:《伯恩斯坦教育社会学理论探析》,载《上海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3期。



的。本文的旨意在于提供一种分析的思路,以便能对少数民族子女的学业失败问题以及失学与辍学问题做出多方面的解释,最终找到合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与途径。

#### 四、教师的流失

在少数民族地区中,教师流失问题严重地影响着当地的教育发展,从所调查的这四个县(旗)来看,教师的流动存在着两种主要途径:跨行业流动与跨区域流动。

**跨行业流动**:近几年来,教师的生活待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与其它行业相比,教师的收入与待遇相对较低。在调查中,一位老教师告诉调查人员,兴和一中的校长月工资为 320 元,高级教师月工资为 360 元,普通教师月工资为 240 元左右,而他们刚培养出去的学生,到银行邮电部门工作的每月可领到 500 多元的工资;内蒙古地区属边疆,风沙较大,国家规定职工每月享受 30 元的风沙补贴,银行邮电部门职工均享受这一待遇,教师却没有;公费医疗一年比一年少。1992 年教师公费医疗人均 24 元,1993 年降为 18 元,1994 年则取消了公费医疗。从教师住房情况分析,西苏旗一中曾用 5 万元解决了 20 户教职工的住房,可以想象这样低造价的房子质量。二中却连单身教师的住房都解决不了,成家的教师有许多人租住他人门房。职业中学有 47 名教职工,其中有 16 人申请要房。再说,社会其它部门能解决子女就业问题,而教育部门子女的就业很难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不得不“跳槽”。仅西苏旗一中近十年就有 20 多名骨干教师流失。尤其是中青年教师要求改行的特别多。调出的教师大多调到当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任文字工作。其中尤以中文骨干教师居多,初中高中教师流失率高于初小教师的流失率。但调出去

的教师基本上都比学校里的教师境遇好,这种反差,是教师队伍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上述原因,县旗都采取了教育保护政策,尽可能加大教育的投入,提高教师的待遇。但这些福利与其它行业相比可谓“杯水车薪”。于是,为了控制教师的流失,当地政府在全县(旗)教育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具有合格学历和取得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调出教育系统,均由县(旗)政府批准。严禁师范毕业生改行,确保师范毕业生分配到教学第一线。

跨地区流动:近几年来,由于中国地域、环境、资源、人才资本、机遇等条件不同,出现了东西部经济非均衡的发展态势。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特别快,同时也带动了教育的发展,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缺乏教师,尤其缺乏合格的、有经验的教师。他们以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工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待遇向内地广招人才,结果内地许多教师纷纷“孔雀东南飞”。这些发达地区在人事制度上简化办事,内地大学毕业生及优秀教师只凭毕业证书和技术职称证明即可任职任教。沿海有些地区淡化了拴住人才的户口和档案材料的人事管理制度,当地部门可以为这些引进的人才重新立户立档。在这种情势下,内蒙古各县旗政府单靠行政手段就很难控制教师的流失。商都县近几年考入师范学校 400 多名,只回来 50 几名,大部分毕业生去了山东等地任教。仅 1993 年,商都县就有 10 几名师资流失。1994 年有一本科毕业生刚刚分到商都县十八顷乡中学,就调到了山东工作。尽管当地政府教育部门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单靠行政手段是无法控制人才外流的。

关于对教师流动现象的分析,本文认为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形势给人才流动注入了活力,当然也为教师带来了新的选择机遇,80 年代人才去海南热,就已

经有很多教师辞职南下,这种现象曾使内地许多学校大为恐慌。但很快人们就适应了这一形势,在不断的调整中,加大了对教育投入和改革的力度,使学校对教师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教师进出渐趋自由,流动稳定。

从内蒙古来看,教师流失为学校教育所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低估的,要想制止这种现象的继续扩大,当地政府一定要改变现在的办学模式,变政府行为为社会行为,全区各行各业共同关心教育事业,投资渠道多样化。鼓励民办公助的学校,发展适合本地区经济建设需求的职业学校,有选择地将一些普通中学转为职业中学。注重职业教育的师资水平和待遇的提高,发挥职业教育“育人”与“生利”的功能。与发达地区加强横向联合,充分利用强区、强校的各种优势,扶植弱区、弱校。另外,要加强与当地企业和用人单位的联系,实行企业学校合办职业培训学校。在有条件的地方办民族高等职业学校,逐步培养出具有高等职业技术的科技人才队伍。发挥高校人才科研优势,开发民族资源,积极建立新的就业渠道,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 五、余 论

如上所述,就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出现的危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个现代人或后工业化人类的共同问题,是一个文化前途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文化的人重视和深思”。<sup>①</sup>

费孝通先生最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

---

<sup>①</sup>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人类学与民俗研究》,1997年第32—33期。

“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并指出了“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sup>①</sup>”。费先生这句话从文化意义上指出了我国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最后,我想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语作为我的结束语,“我特别关心的是另一方面的教育工作,那就是怎样去培养出善于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里能和平共处、并肩前进的 21 世纪的人……”费先生还说,“我想提出来讨论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从人的思想和意识方面积极地进行和平共处的教育,就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的和共存的教育体系。我称这种体系为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up>②</sup>

---

①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② 费孝通:《从小培养 21 世纪的人》,载《费孝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1—223 页。